

〔美〕张 灏／著

崔志海 葛夫平／译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Documentary Press

〔美〕张 灏／著

崔志海 葛夫平／译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 (美) 张灏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117-2732-9

I. ①烈… II. ①张…

III. ①谭嗣同 (1865 ~ 1898) — 人物研究 IV. ① B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494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贾宇琰 杨宝珠

特约编辑：张少军 杨晓琼 潘梦琦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158 千字

印 张：6.75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目 录

原版前言	1
序论	3
性格、身世与环境	9
心路历程之一——宗教心灵的涌现	27
心路历程之二——影响和变化	45
心路历程之三——由保守到激进	53
谭嗣同的仁学	67
结论	101
参考书目	109

附录

政教一元还是政教二元？——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	115
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从史华慈教授的超越观念谈起	145
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	161
张灏：“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 / 崔卫平	201

原版前言

这本小书是我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英文本的副产品。在那本书里，我讨论了谭嗣同的思想，可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对谭嗣同的思想作一全面的分析，因此有这本小书的尝试。此书问世之时，正值外婆逝世三十周年纪念。谨以此书献给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张灏

1987年初夏

序论

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他的一生总共只有三十三年，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也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感人的身世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本小书，不是谭嗣同的传记，而是希望透过他的一生行迹和他的作品，勾画出他的主要思想发展，他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的心路历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因此，透过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看见一些近代思潮演变的痕迹。

称之为“心路历程”，不是随便的譬喻，因为我在这里所谓的思想，不仅是指观念层次上的意识，同时也是指情感层次上的意识，它包括内心生活的各面，只有综合内心生活的各面，我们才能看到谭嗣同的精神全貌、他的心灵世界。

大约而言，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观念发展式的思想（history of ideas）。这种思想史的着眼点是观念的历史发展，它的主要目的是看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而分析这些观念间的衍生与逻辑关系，探讨这些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所产生的紧张性和激荡

性。西方史家鲁佛觉 (Arthur Lovejoy) 的《存在的链锁》(*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和莱根 (Anders Nygren) 论“爱”这一观念在西方传统里的演变 (*Agape and Eros*) 都是这一类思想史的典范之作。^①用这种思想史来处理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不拟采取这种方法,因为谭嗣同不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本身,抽离地或者孤立地去看,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因此,我所采取的是另一种治思想史的途径,那就是把他的思想放在他的时代脉络里去看,看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如何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只有这样来处理,谭嗣同的思想的历史意义才能彰显。

谭嗣同生长的时代是 19 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他的思想由成熟到发挥影响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进入一个转型的时代 (1895—1911)。^②在这转型过程中,谭嗣同的思想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要替他在当时的思想界作为一个定位并非易事。首先,当时思想界的重大论争,他几乎都未曾直接参与。当时辩论激烈的今古文之争,谭嗣同并未真正卷入。梁启超与康有为本人都强调谭嗣同受康有为之今文学的影响。^③事实上,康梁的这种强调都嫌夸大。谭嗣同受康有为之影响甚晚,直至死前的两三年他才与

①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Harper and Row, 1969.

②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2, Late Ching: 1800-1911*, pt.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4-338.

③ 见梁启超的《仁学序》及《谭嗣同传》,收于《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版),关于康有为自认对谭之影响,见康著《六哀诗》,此诗也收入《谭嗣同全集》,第527页。

康有为的思想有所接触，而其时他的思想的基本形态已大致形成。故当时康有为的今文学虽然在谭嗣同的思想里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却与他的基本思想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此外，清季的另一思想论战——革命与改革之争^①，谭嗣同也未介入。这固然是由于这个论战主要爆发在谭嗣同戊戌死难之后，但更重要的是，他晚年虽参加康梁变法，他的思想实兼有当时所了解的革命与改革两种成分，假若他未死于戊戌之难，他后来的思想演变究竟属于改革型还是革命型，实在很难说。

以当时思想界的重大论争去给谭嗣同“定位”固然不易，以今天史学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些流行的观念去了解他的心态也颇有隔靴搔痒之虞。“民族主义”这个常用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不错，民族主义之变为近代中国的一个主要思潮，是始于清季转型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思想虽含有一些国家观念与种族意识，这些观念和意识对他的中心思想却影响不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谭嗣同思想为“世界主义”^②，实在是有所见而发的。

除“民族主义”之外，中外学者有时以“现代化”这个观念去分析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趋势，但所谓“现代化”是现代学者所用之范畴，是否可以适用于清季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很成问题。大致而言，“现代化”这一观念有广狭二义：就其狭义而言，“现代化”与一般所谓的“经济发展”不分；就其广义而言，则指社会学家以韦伯（Max Weber）的“功效理性”

^① 关于此论争，见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1964年；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1964年；英文有关著作，参见 Mary B.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 1971，及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Seattle, 1969；日文方面有关著作，参阅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京都，1960年，第七章：“章炳麟排满思想”，第398—480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1963年。

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性化”这一发展过程。重要的是,不论是狭义或广义,“现代化”都不是以“道德取向”为主的概念,而谭嗣同的思想却含有极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在诠释谭嗣同的思想时,我们很难乞助于“现代化”这一范畴。^①

此外,已故美国学者李文孙^②(Joseph Levenson)在其所著《中国儒家文化与其命运》一书中,曾特别强调“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这一观念,并以此去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态。^③李文孙此处所谓之“文化认同”乃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荡之下,由挫折感与屈辱感所产生的文化自卑心理。李文孙认为,由于这种自卑感的作祟,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往往有美化传统的心理需要。^④从这个观点去看,谭嗣同早年思想容或含有这种心理因素。但其晚年成熟之思想则难以用此种心理解释去概括。由上面的分析可见:现代史家所习用的一些观点与范畴,我们都不能借以窥谭嗣同思想的全豹。

因此,今天我们要了解谭嗣同之思想特色,必须跳出既有的一些观点的窠臼。我们必须认识到,谭嗣同的一生,因为兴趣和活动极为广泛,其思想难免相当驳杂,但是我们若仔细分析他一生的著作和行迹,亦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有其脉络可寻,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透露出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充分反映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上:

① 关于“现代化”这一观念的讨论,西方论著甚多,其于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适用性,可参见: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2-3.; 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s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Spring, 1972, pp.71-88.

② 本书译为李文孙,今多译为列文森。——编者注

③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1958, “Introduction”, pp.xiii-xix.

④ Ibid.

戊戌死难时他所表现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难前两年所写的一本书——《仁学》。要了解这种心态和产生这种心态的思想背景，我们必须先对他个人的性格、身世和环境作一番分析。

性格、身世与环境

谭嗣同从小就展现出他的性格中最大特色：丰富的情感与豪迈的气质。这种“浪漫型”的性格，在他早年生命的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一是他的诗词。谭嗣同从少年时就开始写诗词，许多作品极富感性，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与才华。例如他在十五岁时为送别他的仲兄赴甘肃省父，写了一首七绝：

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频将双泪溪边洒，
流到长江载远征。

碧山深处小桥东，兄自西驰我未同。羡煞洞庭连汉水，
布帆斜挂落花风。

萧萧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我愿将身化明月，
照君车马度关河。

鹧鸪声里路迢迢，匹马春风过灞桥。灞上垂杨牵客思，
也应回首故乡遥。

春烟澹澹黯离愁，雨后山光冷似秋。楚树边云四千里，

梦魂飞不到秦州。^❶

谭嗣同的感情不但发为浓厚的手足之爱，而且也时而表现为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和正义感。在旅行时，偶尔见到一些悲惨的或者不平的事件，便会触发他的情感，反映在他的诗篇里。例如，他在二十四岁出外旅行时，曾写下《儿缆船并叙》这样一篇诗章：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舟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屡仆，持缆愈力缆靡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同年，他又写了下列两首小诗：

罌粟米囊谣

罌无粟，囊无米，室如县罄饥欲死。饥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疗饥，罌粟裁千里。非米非粟，苍生病矣。

❶ 见《谭嗣同全集》，第487页。

六盘山转饷谣

马足蹙，车轴折，人磋跌，山岌山业，朔雁一声天雨雪。
 與夫與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
 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
 血！^❶

短短的几行，淡淡的几句，这些小诗却道尽了他对社会大众的关怀和同情！

至于他性格中豪迈超逸的一面，谭嗣同在他十八岁时，为自题小照所写的一首《望海潮》词里，曾有清楚的流露：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
 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
 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
 自看如何；鉴不因入，形还向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
 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❷

“诗如其人”这句话，就谭嗣同而言，是再恰当不过了。谭嗣同在这首词中自称“有几根侠骨”，而他的一生行迹也确实常常显出侠气纵横，这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突出面，据梁启超说，谭嗣同年轻时“好任侠，善剑术”，当他父亲在甘肃服官时，他常常出入西北边塞，骑马射箭，追逐

❶ 《谭嗣同全集》，上引三首小诗各见第461、462、463页。

❷ 同上书，第277页。

驰骋。^①这种任侠的倾向，正如同他丰富的感情，是他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对于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要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他的主观性格和禀赋固然重要，客观环境也同样不容忽视。与许多人一样，谭嗣同的思想大部分来自他对所处环境所作的回应。所谓环境是指三个因素。首先是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他的家世。这个因素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因此受到极良好的传统教育。父亲的游宦，加上他本人南北奔走应试，使他有許多旅行游览的机会。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一文中，对自己的旅行之广，特别引以为傲，他曾计算他的旅行“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②。这些旅行自然增广了他的交游与见识，开阔了他的眼界，例如他在二十六岁时，曾随他的父亲赴湖北巡抚任所——武昌。武昌也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驻节所在，张的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汪康年、缪荃荪、徐建寅与黄绍箕等，都是当时有学问、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谭嗣同在武昌有机会与他们结识来往，对他的眼界和学识自然极有增益。^③

谭嗣同的家世不但给他一个良好的学识环境，也给他带来很多问题和困扰，对他的精神产生相当的刺激。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僚，有妻有妾。谭嗣同是嫡出，但母亲死得很早，在家里很受庶母的歧视，和父亲的感情也有隔阂。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曾提及他的家庭：“吾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④可见家庭给他带来的痛苦。

要了解环境如何影响了谭嗣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家世背

① 《谭嗣同全集·刘云田传》，第170—172页；《致刘淞芙书》，第376页；《与沈小沂书》，第431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三十自纪》，第205—206页。

③ 杨廷福：《谭嗣同年谱》，北京，1957年，第57—58页。

④ 《谭嗣同全集·仁学·自叙》，第3页。